

依托大数据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

核心阅读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运用大数据提高社会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整体性、开放性、预见性，是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

□ 孙 涛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随着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普及和推广，已成为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动力。运用大数据提高社会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整体性、开放性、预见性，是落实十九大精神，增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的必然选择。

依托大数据促进民主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大数据共享可以有力地促进基层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不断扩大社会治理参与主体的范围，提高社会治理的民主化程度，促进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形成和完善。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发展，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向线上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互联网及大数据的迅速发展逐步改变了以往“全能政府”的格局。在大数据时代，信息资源在政府、市场、社会和个人等主体间做了重新分配，“谁掌握了信息，谁就掌握了一定的权力”，这在客观上赋予市场、社会、个人更多的参与机会，促进了以往单向度管理向协同化治理的转型。通过多元主体的参与合作，逐步明晰不同主体间的界限、权责和职能，发挥不同主体的比较优势，可以从技术、人才等多个方面弥补政府治理资源不足和政府治理失灵问题，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依托大数据促进科学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引入大数据可以有效提升治理主体的分析能力和决策能力，提高其通过现象看清本质的能力和应对风险能力，进而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化程度。在“数据治国”时代，政府要遵循“循数治理”原则，做大数据的收集者、传递者、分析者、使用者和共享者，突破传统依靠经验决策的路径依赖。大数据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为社会治理决策提供依据和便利，让决策者能够通过社会治理领域的种种表象发现本质规律，理清社会治理决策中诸多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可以改变以往通过简单调研就制定政策的传统决策方式，有效解决根据“少数人”的



社会需求来推断多数人乃至本地区当前和未来需求的问题。运用“数据驱动”的方式应对和解决社会治理中的复杂问题，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新型社会治理机制。另外，通过大数据收集挖掘和分析研判相关信息，采用人工智能等治理工具对决策全过程进行仿真模拟，可以让社会政策更加贴近多数人的需求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依托大数据促进整体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大数据运用将不同部门的信息资源整合在一起，逐步解决跨部门合作难题，可以有效降低社会治理成本，促进整体治理。一直以来存在的“碎片化治理”难题是制约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瓶颈，具体表现在不同部门之间各自为政，依据本部门的有限数据进行决策。这种片面而封闭的传统治理方式极易造成决策偏差，而且会加大政府行政成本，降低行政效能。大数据的引入为解决该问题打开了一扇窗户。依托大数据技术，通过“云服务”等方式将不同部门信息资源整合在一起，建立社会治理大数据信息库，逐渐促进信息资源的共享，可以跨越部门之间协同治理的鸿沟，极大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据统计英国政府通过引入大数据，每年至少节省230亿英镑的行政费用。大数据的传递渠道是扁平化、即时性的网络，可以迅速搜集分析相关信

息，第一时间提出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例如在旧城改造中，通过引入大数据全面了解住户的信息和需求，可以降低沟通中的对抗情绪，提高群众满意度。

依托大数据促进开放治理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通过大数据引入可以及时发现人民群众的需求，助力群众对政府社会治理行动进行监督和量化评价，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大数据具有全面、高效和精准的关联分析功能，可以为精确高效、灵活多样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和社会治理提供技术支撑。所以，通过大数据引入能够推进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让政府能够以公众需求为导向，对公众需求做多层次、多维度细分，对公共服务的标准、机制进行流程再造，提高政府供给和大众需求的契合度，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此外，通过多元数据的挖局分析，能够摸清公众的服务体验，进而为改进服务方式、优化服务资源配置、调整服务种类提供依据，实现公共服务的精准化和个性化目标。例如在扶贫工作中，采用大数据技术改革以往人工核查方式，整合多部门数据建立扶贫信息系统，可以确保扶贫资金的精准投放，实现扶贫对象的精确识别、精细管理和精准帮扶。

依托大数据促进有预见性治理推

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去我国社会治理目标定位于“稳定压倒一切”，为达到这一目标的社会治理实践往往是一种静态社会治理。这种方式注重事后弥补而疏于事前预防，注重出现问题后的被动治理，社会危机监测和预警系统建设滞后，对可能造成损失的潜在治理风险防范不够，无法及时、全面、准确发现社会问题、把握社会发展动向，及早推出防范应对措施，把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风险社会来临后，事前预防、监管已成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当务之急。大数据时代到来为社会风险精准预测、社会矛盾精准调控提供了契机，为揭示大数据中隐藏的社会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提供了可能。社会领域处于迅速变化之中，各类社会要素大规模流动、社会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社会大众情绪波动问题异常突出。大数据引入可以助力政府部门及时掌握社会问题发展趋势和社会心态变化，为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加强公共安全体系、社区治理体系、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

社会治理



旅游与文化如何真正实现融合发展

□ 田 侠

核心阅读

“文化为魂，旅游为体”。对于旅游业而言，寻找一个项目的核心竞争力和战略方向就是“找魂”，这恰是基于文化高度、生态高度和消费需求的有机结合，也是旅游项目内容支撑的核心要义。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的明确，为文化和旅游的融合互促提出了新要求。改革开放40年来，旅游业所取得的历史发展成就和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不可磨灭，值得肯定。但不管是从人的需求来看，还是就其所对应的供给而言，文化与旅游皆由千丝万缕粘连于一体。诚如已故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所言，“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生活，而且也是一种文化生活”“旅游是文化性很强的经济事业，又是经济性很强的文化事业”。在此背景下，如何通过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发展，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命题。

旅游功能要重新定位。人类旅游行为由来已久。众所周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不仅开辟了绵延至今的“丝绸之路”，更是将中国的文化传播出去，将西域的文化带入本土，促进了民族间文化的交流交融。唐朝名僧玄奘西去印度17年，除取回佛经，还写成《大唐西域记》，记述了他西游亲

身经历的100多个国家及传闻的28个国家的山川、地邑、物产、习俗等。中国国内旅游的开山鼻祖徐霞客，抱着考察祖国地理地貌、了解掌握各地风土人情的初心，散尽家财，遍游天下，成就了“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在中国地理学、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徐霞客几乎是同时代的中国名僧隐元大师东渡日本，传播佛学经义，带去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可见，旅游的首要功能是人们探寻文化根源、增长见识、民族文化交流的载体和手段。在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旅游业更需要强化旅游文化功能成为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

迫切要求。为此，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旅游与文化旅游发展需要亦步同趋，以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旅游产业属性要重新认识。**作为一种经济形态，旅游业被称为“无烟工业”，成为我国搞好对外开放工作的一种先导、促进和保障因素。1985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把旅游业作为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一项事业，正式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全国各地都把发展旅游业同发展经济紧密结合，一些地方甚至把发展旅游业作为振兴当地经济的一个突破口，在促进地方搞好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横向经济联合、解决劳动就业等方面都发挥积极作用。旅游经济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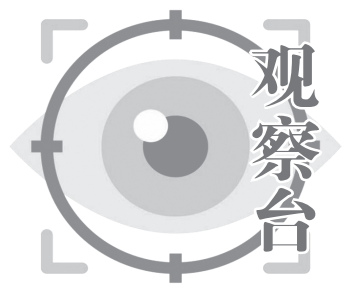
益追求首当其冲，后来甚至呈现一座山搞活一个地区、一个湖繁荣一个县、一个洞富裕一个乡、一项旅游活动提高一个地方知名度的效果。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旅游功能及属性的变化应与时代发展相适应，旅游产业的属性需要我们去重新认识。为此，旅游产业应从过去的追求经济效益转变为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即便从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看，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是旅游产业发展的水之源、木之本，旅游产业应属文化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

旅游基本要素应予以重构。良好的物质和人文基础是其要件。旅游业在40年来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了“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

素，涵盖了一定历史时期人们的所需所求。但在把旅游业定位侧重于或单纯认定为经济产业的历史时期，“游、购、娱”三要素引导了人们的价值选择，似乎成为人们外出旅游的主要目的和追求。同时，这三大要素还裂变出宰客、宰客和低价、庸俗、恶俗等旅游市场顽疾。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转变的新时代，“游、购、娱”应完成其历史使命。旅游是人们集物质消费与精神收获于一体的行为，除了游览自然风光、享受生态环境之外，不能再聚焦购物、千篇一律的简单娱乐上，应重新审视旅游，真正实现旅游和文化体魂合一。正如1980年世界旅游组织大会通过的《马尼拉世界旅游宣言》

指出：“旅游是人类实现自我精神解放的重要途径。旅游的本质就是要让人们通过观光、休闲、度假等开阔视野、增长见识、陶冶情操，实现精神愉悦。”适应新时代旅游业发展要求和规律，要将旅游“食、住、行、游、购、娱”六要素改为“食、住、行、游、知、愉”新六要素。这里“购”改为“知”比较容易理解，从强调购物转变为对民俗风情、历史传统文化等了解和把握，增长见识为主；将“娱”改为“愉”，则是从感官刺激追求导向上升为以满足人类更高层次需求的内在精神愉悦为重。“游、知、愉”能够更加使“旅游者在欣赏自然风光、名胜古迹、风土人情的同时，也获得了历史文化、民族传统、文学艺术和科学常识等方面知识，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接受了教育”。

总之，文化与旅游是一对“孪生兄弟”，文化与旅游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耦合性，这也决定了文化与旅游具有很强的融合性，旅游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化的“化人”途径。当今世界，文化正成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旅游则是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必需。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游，用旅游的方式传播文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观察台



发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 易海云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这一重要论述，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奋力谱写建设教育强国时代新篇章的重要遵循，对于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发展、大力提高国民素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教育公平状况不断改善，教育改革开放持续推进，教育质量显著提高，总体发展水平跃居世界中上行列，教师队伍建设不断加强，为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发展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需要各级教育部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创造新业绩。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抓紧抓好。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保证社会主义办学正确方向，推动各级各类学校切实承担起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时代重任。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和教育工作者的政治引领，督促其以转变教育观念、提高职业道德和教育教学水平为重点，引导树立正确的教育观、质量观和人才观。充分发挥课堂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找准学科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结合点，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落实到教育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持续推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当前，学前教育仍存在入园难、入园贵的现象；义务教育阶段控辍保学，把义务教育巩固率从93.4%提高到95%使命艰巨；到2020年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考招生制度体系仍需继续努力。这三块“硬骨头”是教育面临的现实挑战，需要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做到保基本、补短板、促公平，全力保障“学有所教”、努力实现“学有优教”。进一步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加大对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幼儿园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幼儿园建设与城镇化、“二孩”

政策的衔接，在城镇新建小区建设普惠性幼儿园。建立健全控辍保学工作机制，提高质量控辍，落实扶贫控辍，强化保障控辍，避免因学因困难或厌学而辍学，避免因失学辍学，避免因上学远而辍学。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走出一条既扎根中国大地、契合国情校情，又融通中外、具备全球视野的“双一流”建设之路。

提高教育质量，关键要有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坚持把教育培养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引导广大教师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坚持教书和育人相统一。教师不能只做传授书本知识的教书匠，而要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位的大先生，把知识教育同价值观教育、能力教育结合起来，把思想引导和价值观念塑造融入每一门课程的教学之中。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在于课堂里怎么说，更在于课堂外怎么做，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赢得学生敬仰，以模范的言行举止为学生树立榜样。